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红星,卢川,孙建辉.曾侯世系辨正[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3):46-51.

曾侯世系辨正

王红星¹ 卢川² 孙建辉³

(1. 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文物局,湖北 荆州 434000;2.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3. 随州博物馆,湖北 随州 441300)

摘 要: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资料,对曾侯墓葬的规模、礼乐器组合、曾侯自铭等现有曾侯实物史料进行全面梳理,确认迄今为止已发现 15 位曾侯、4 个曾侯墓地,并发现其间有一定规律。曾国历史时间框架,早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曾国主要时段的政治中心,均在今随州市境内。

关键词:曾侯;叶家山;枣树林;文峰塔;擂鼓墩

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1)03—0046—06

曾侯世系的科学认定,对于曾国历史时间框架的建立、政治中心区域的确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最早就曾侯世系进行系统探讨的是张昌平先生,他通过对传世及出土铜器进行全面梳理,认为有 8 位能确认为曾侯。^[1]随着近年曾国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曾侯世系的探讨亦成为热门课题。黄尚明根据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除南宮括未赴任外,目前能确认的曾侯有 12 位。^[2]黄凤春同样认为能确认 12 位曾侯,具体是哪些曾侯则与黄尚明小有出入。^[3]其后,方勤提出:出土曾国铜器铭文中,名号明确的曾侯已见 9 位,加上虽没有曾侯铭文铜器出土,但墓葬规模相当于诸侯的墓主,以及具有谥号的曾侯,目前考古发现的曾侯共计 20 位。^①

判断是否为曾侯,最直接的依据当是铜器铭文自铭为曾公或曾侯。其次,墓葬规模及出土铜礼乐器组合是否符合诸侯之礼。再者,即便墓葬规模及出土铜礼乐器组合符合诸侯之规制,还应考察墓主身份,如为夫人墓也应排除在曾侯之外。笔者以上述依据为准则,对目前所见可能为曾侯的实物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勾勒出相对接近历史真

实的曾侯世系。

一、西周早期曾侯墓

叶家山 M65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 5.02 米、南北宽 3.50~3.62 米,墓底长 4.84 米、宽 3.18~3.26 米,方向 106°。该墓出土随葬器物 160 件(组),其中铜礼器 22 件(组)。铜礼器组合中有方鼎 1 件、分裆鼎 1 件、圆鼎 5 件、簋 4 件。有铭文青铜器达 11 件,1 件方鼎、1 件圆鼎和 1 件簋上均有“曾侯谏乍宝彝”,1 件盃上为“侯用彝”,1 件壶上为“曾侯作田壶”。出土兵器 53 件,其中有 1 件象征兵权的龙形钺。根据该墓墓葬规模、铜礼器组合、铜器自铭、掌控军权等曾侯墓特点,可知该墓为曾侯谏墓。^[4]距 M65 西北 13.2 米的 M2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 4.6 米、宽 3.1 米,方向 90°。虽然该墓早年被盗,但仍残存随葬器物 45 件,其中有 9 件铜礼器,不见兵器。铜礼器中有 1 件圆鼎和 2 件分裆鼎,上有铭“曾侯谏乍宝彝”,另外 2 件簋和 1 件甗上有铭“曾侯谏乍宝彝”,作器者都为曾侯谏。故推测 M2 墓主为曾侯谏的媿姓夫人。^[5]从已有资

收稿日期:2021-02-25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楚简与楚国城市研究”(CWH202009)

第一作者简介:王红星(1957—),男,湖北武汉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楚文化考古研究。

① 方勤《湖北考古发现 20 位曾侯,谁是爷爷谁是孙子终于厘清了》,见 2019 年 2 月 21 日 <http://news.cnhubei.com/wenhua/xw/p/10310284.html>。

料考察,M65和M2的墓坑基本上在一条东西中轴线上,M65在西,M2在东,其间没有墓葬阻隔。从两墓随葬器物综合考察,其下葬年代大体相近,应比简报作者所定年代稍早,为西周成康之际。M65出大量兵器,并有1件龙形钺,墓主为男性无疑。据研究,商周时期“出土一件中型方鼎者多数为王室重臣,少数为方国国君”^[6]。该墓出土铜方鼎1件、铜圆鼎5件、铜簋4件,出土铜礼器组合规格与此墓所出5件铜器自铭之“曾侯”身份基本吻合,符合曾侯葬制。其墓坑不带墓道,墓坑规模较其他曾侯墓要小,当与其年代相对较早有关。M2与M65在布局上联系紧密,下葬年代相近,不出兵器,墓主可能为女性。M2随葬器物除3件曾侯谏器之外,还有3件曾侯谏作媿器。其墓坑规模小于M65,也符合夫人墓小于侯墓的常理。因此,M65、M2应为西周成康之际的曾侯谏夫妻异穴合葬墓。

叶家山M28为不太规整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道向西,墓口东西长7.4米、南北宽5.7~6米,墓底东西长7.2米、南北宽5.5~6.2米,方向100°。在墓坑以西约8米处发现1座葬有8匹马的陪葬马坑,其归属应为M28。M28早年被盗,但仍残存随葬器物662件,其中铜礼器27件。铜礼器组合中有方鼎3件、分裆鼎2件、圆鼎2件、簋4件。有铭青铜器礼器多达21件,有曾侯铭文的铜器达18件之多。其中,曾侯谏自作之器有方鼎2件、圆鼎2件、分裆鼎2件、簋1件、盃1件、盘1件,共9件;曾侯谏作媿器有簋2件、卣2件、壶1件、尊1件,共6件;无私名的曾侯器有带盖方鼎1件、鬲1件、甗1件,共3件。出土兵器265件,其中有1件象征兵权的铲形钺。^[7]M28之东12.1米的M27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6.7~6.8米、南北宽4.9~4.95米,方向100°。出土随葬器物121件,其中铜礼器27件,不见兵器。铜礼器中有方鼎2件、圆鼎3件、簋4件。2件方鼎有铭“曾侯乍宝尊彝鼎”,1件盃有铭“白(伯)生乍(作)彝,曾”。^[5]M28、M27的墓葬规模均大于M65,且M28出现了西向墓道,还陪葬有1座马坑。两墓的墓坑基本上在一条东西中轴线上,M28在西,M27在东,其间没有墓葬阻隔。从两墓随葬器物综合考察,其下葬年代大体相近,应在西周康王时期。M28出大量兵器,并有1件铲形钺,墓主为男性无疑。M28出土的铜礼器组合,与该墓18件铜器自铭之“曾侯”身份相吻合,符合曾侯葬制。M27与M28在墓地布局上联系紧密,下葬年代相近,不出兵器,墓主可能为

女性。最为重要的是,M28所出1件带盖曾侯方鼎,与M27所出2件曾侯方鼎,在形制、大小、纹饰、铭文诸方面,完全相同,说明原应为一套,可证M28、M27是为一组曾侯夫妇异穴合葬墓。但是,M28出土自铭曾侯谏器9件,曾侯谏作媿器6件,远多于M65出土的自铭曾侯谏器3件,是否M28才是曾侯谏墓呢?M28出土的曾侯谏方鼎、曾侯谏簋与M65出土同类器的形制、大小、纹饰和铭文完全相同,M28所出的曾侯作媿簋与M2所出的曾侯作媿簋的形制、大小、纹饰和铭文也完全相同。经比较分析认为,它们极有可能原为一套完整的曾侯谏制器,因事丧的对象、时间不同,故分葬于不同的墓葬中。^[8]叶家山墓地共出曾侯谏自铭铜器16件,分别见于M65、M2、M3、M28等四座墓葬,这四座墓葬位置相近,M2、M3、M28环绕着M65。叶家山墓地出土曾侯谏作媿自铭铜器共见9件,只出于M28、M2两座墓葬。西周、东周时期,诸侯墓葬一般不出诸侯为夫人所作之器,夫人墓则有可能出夫君诸侯的器物。M28已明确是曾侯墓,媿器又仅见于墓地女性墓M2中,因此基本可确认M2为曾侯谏夫人墓,亦可旁证M65为曾侯谏墓。M28出曾侯谏作媿器6件,依西周之制,弟弟墓中似不当出现其兄之夫人(即其嫂)之器。如此,M65与M28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父子关系,父子传承,是礼制之必然。M27:15盃铭“白(伯)生乍(作)彝,曾”^[5],说明作器者为伯生。M27既为M28之夫人墓,则伯生自然有为M28墓主人之可能。依据上述可初步认定,年代在西周康王时期的M28、M27,是曾侯谏之子曾侯伯生及其夫人的夫妻异穴合葬墓。

叶家山M111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13.08~13.18米、南北宽10.1~10.28米,墓底东西长8.08~8.28米、南北宽5.58~5.98米,方向105°。在其西侧,有三座马坑K2、K5、K7,分别埋有4、8、10匹马。该墓出土铜器170件(主要为车马器),墓中随葬品2700件,其中铜礼器58件。铜礼器组合中有方鼎6件、圆鼎14件、方座簋1件、圈足簋11件。有曾侯铭文的铜器达15件,在2件铜簋上发现“曾侯玃乍(作)宝鬲彝”^[9],1件铜方座簋上发现有“玃乍(作)刺(烈)考南公宝彝”^[9]的铭文。还出土了1件镈钟、两两成对的4件甬钟。墓室出土兵器1323件,其中有象征兵权的太保虚钺1件、半环形钺2件、斧形钺2件。M111是叶家山墓地规模最大、出土铜礼器数量最多、墓主为曾侯最无争议的墓葬,其下葬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昭王时

期。^[9] M111:67 方座簋铭“猗作烈考南公宝彝”^[9],表明铸器的目的是用来祭祀其父南公,猗称南公为烈考,可知其应为南宫之嫡子。M111:67 方座簋自铭“猗乍(作)刺(烈)考南公宝彝”^[9],器物形制特点较早,M111:59、60 两件带盖圈足簋自铭“曾侯猗乍(作)宝彝彝”,器物形制特点稍晚。前者自称“猗”,后者自称“曾侯猗”,可见铸作祭祀南公之器时,猗尚未封侯。两件自铭“曾侯猗”器下葬,证明 M111 墓主并非南公,而应该是曾侯猗。前述曾侯猗为南公嫡子,那么,曾侯谏、曾侯伯生是否皆出自南公氏?还是如朱凤瀚所言,只有曾侯猗出身于南宫氏,曾侯谏、曾侯伯生并非南宫氏所出,因曾侯伯生早逝,无人承爵,方才于昭王南征荆楚前,续封曾侯猗于曾^[10],目前尚无定论。即便如此,M111 为西周昭王时期的曾侯猗墓应没有问题。

有学者根据 M111 处于叶家山墓地最为突出和尊显的位置,部分器物仍保留有商代晚期的特征,认为该墓地曾侯墓的早晚系列应为 M111→M28→M65。^[11]实际上,判断墓葬的下葬年代当以最晚的器物特征为准,M111 出土的部分铜器特点与学术界达成共识的西周昭王时器有类似特点。M111 不见分裆鼎等晚商以来的传统器类,但已出现西周早期偏晚开始兴起、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罍钟、甬钟。M65 至 M28、M111 墓坑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出现墓道、陪葬马坑,也符合曾国势力在南方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强盛的历史史实。另外,枣树林曾侯墓地发现的曾侯墓从早到晚、由北往南排列的葬制规律^[12],也旁证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早晚系列,亦应由北往南排列,其早晚系列应为 M65→M28→M111。

二、春秋早期曾侯墓

1966 年京山苏家垅水利建设工程中,发现青铜器 97 件,其中铜礼器有鼎 9 件、簋 7 件、鬲 9 件、甗 1 件、豆 2 件、方壶 2 件、盃 1 件、盘 1 件、匜 1 件,共 33 件。涉及曾的铭文铜器 6 件:2 件鼎铭“曾侯仲子父徯自乍鬻彝”,2 件豆铭“曾仲旂父自乍宝甬”,2 件方壶铭“曾仲旂父用吉金自乍宝尊壶”。报告认为,大小有序的 9 鼎是列鼎,器主为曾侯仲子旂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3]这组器物出土情况不详,有可能出自墓葬。2 件有铭鼎与另 7 件鼎铸制时间不同,9 鼎配 7 簋亦不合规制,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 9 鼎就确定其为曾侯。鼎铭“曾侯仲子徯父自乍鬻彝”,明确指明旂父为曾侯之仲子,故不能将旂父认定为曾侯。

郭家庙 GM21 为“甲”字形竖穴岩土坟墓,墓口东西长 11 米、南北最宽处 11 米(早年塌方),基底东西长 6.56 米、南北宽 4.12 米,方向 92°。该墓早年被盗,青铜礼器无存,残存车马器等 2355 件。出土 1 件铜钺,两面各有 9 字铭文:正面为“曾伯陟铸威戊(钺),用为民”,反面为“噩(刑),非歷井毆(刑),作为民政”。报告认为,此墓为曾国国君曾伯陟墓,年代为西周末期。^[14]此墓有墓道,规模较大,且出象征兵权的铜钺,应是一位执掌兵权的高级贵族无疑。但其墓口因早年垮塌,致使坑口尺寸增大,但其基底宽尺寸明显窄于西周昭王时期的曾侯猗墓和下文将要论及的春秋中期曾公卨、曾侯宝、曾侯得墓,且 GM21 礼器组合无存,没有曾侯等级的直接证据。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曾侯一概只称曾公、曾侯,并无称伯之例。据此,曾伯陟墓不能确认为曾侯墓。

方勤根据郭家庙 M60、曹门湾 M1 位置显要,墓坑规模较大,且都陪葬车马坑等特点,认为这两座墓葬均为曾侯墓。他还认为“曾侯絳伯秉戈”与曹门湾 M1 出土的其它戈的形制一致,推测 M1 的主人极可能是曾侯絳伯。^[15]遗憾的是郭家庙 M60、曹门湾 M1 均被盗严重,既不知其礼器组合,又无自铭曾侯器,仅凭墓坑较大、陪葬车马坑就认定其为曾侯,似乎依据不足。但是,1982 年农民在枣阳曹门湾采集到一件铜戈,内尾有铭文“曾侯絳伯秉戈”^[16],从戈的型制来看,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此戈自铭曾侯,故絳伯应为春秋早期的一位曾侯。

吴镇烽所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7 卷和第 3 卷,分别著录有某收藏家收藏的两套曾侯子编钟。第一套共 9 件,其钟甲、乙、丙、丁、戊、己、庚铭文为“曾侯子之行钟,其永用之”。钟辛的铭文为“曾侯子之行”。钟壬的铭文为“钟,其永用之”^{[17](P56~71)}。第二套钟共 8 件,其钟甲、乙铭文为“曾侯子之永用之”。钟丙、戊铭文为“曾侯子之其永用之”。钟丁铭文为“曾侯子之其用之”。钟己铭文为“曾侯子之其永之”。钟庚铭文为“曾侯子之行”。钟辛铭文为“曾侯子之”^{[18](P383~390)}。另外,吴镇烽所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9 卷和第 3 卷,还分别著录有某收藏家收藏的两套曾侯子编铙。第一套 4 件,铙间及鼓部铸铭“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曾侯子择其吉金,自作行铙”^{[19](P186~193)}。第二套共 4 件,铙间及左鼓部铸铭“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曾侯子择其吉金,自作行铙”^{[18](P478~484)}。黄凤春认为,在金文中“子”当读为“巳”^[3],甚是。以上 17 件甬钟和 8 件罍钟,时代均为春秋早期晚段,多自铭

曾侯子(巳),可能原应为一套,符合此时曾侯用钟规制。据此,曾侯子(巳)应为春秋早期晚段的曾侯。

三、春秋中期曾侯墓

枣树林 M190 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长 8 米、南北宽 5.8~6.8 米,方向 113°。在墓坑南侧东部陪葬马坑 K3,葬马 20 匹;墓坑南侧西部陪葬车坑 K5,葬车 12 辆。该墓被盗,残存随葬器物 320 件(套),其中礼乐器 48 件。礼乐器组合中有鼎 5 件、钲钟 4 件、甬钟 17 件、钮钟 13 件。已公布铜器铭文资料“曾公𦣻”出现 11 次。M190 之北 10.7 米处的 M191,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长 7.4 米、南北宽 5.28 米,方向 114°。此墓亦早年被盗,残存随葬器物 106 件(套),其中铜礼器有鼎 5 件、簋 4 件。M191:13 鬲口沿有铭“曾夫人渔之𦣻鬻”,M191:36 簋盖底及器身腹底铸铭“佳正月初吉乙亥,楚王媵渔𦣻匠,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之”。据铜器铭文知 M190 为曾公𦣻墓,M191 为曾公𦣻夫人渔𦣻之墓,两墓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20] M190、M191 墓葬规模、礼乐器组合均合曾侯之制,墓主随葬铜器自铭身份清楚,两墓为春秋中期早段的曾公𦣻夫妻异穴合葬墓。

枣树林 M168 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 6.7 米、南北宽 5.7 米,墓底东西长 6.44 米、南北宽 5.34 米,方向 119°。其南侧分别陪葬有 2 个马坑 K2、K4,1 座车坑 CK7。该墓被盗严重,残存有铜鼎 1 件、簋 2 件、簠 2 件、鬲 1 件、缶 2 件、编钟 15 件。编钟、簠、缶上均有铭文“曾侯宝”。M168 之北 11 米处的 M169,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 6.4 米、南北宽 5.4 米,墓底东西长 6.36、南北宽 5.34 米,方向 120°。该墓被盗,残存铜器有编钟 19 件、盘 1 件、匜 1 件、缶 1 件、钲 1 件、匕 1 件。匕、缶、编钟上均有铭文“随仲𦣻加”。据铜器铭文知 M168 为曾侯宝墓,M169 为曾侯宝夫人𦣻加墓。两墓年代为春秋中期。^[21] 2012 年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文物案件,缴获 198 件(套)文物,其中包括 1 件曾侯鼎。鼎铭为“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宝择其吉金,自乍升鼎,永用之”。原报告将“曾侯宝”释作“曾侯甸”,将其年代定为春秋早期。^[22] 现在看来有误,该鼎有可能出自枣树林 M168,其年代应为春秋中期。枣树林 M168、M169 的墓葬规模、礼乐器组合均合曾侯之制,墓主随葬铜器自铭身份清楚,结合墓地布局,可证明其为春秋中期紧接曾公𦣻之后的曾侯宝夫妻异穴合葬墓。

枣树林 M129 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 8.7 米、南北宽 7.8 米,方向 115°。墓坑南侧陪葬有 1 座较大的车坑 CK6。该墓被盗,残存铜礼乐器有缶 2 件、盘 1 件、匜 1 件,编钟 1 套为钲钟 4 件、甬钟 16 件,钟上出现铭文“曾公”20 次,还有石编磬 2 套。另有 1 件铜戈,其上有“曾侯得”铭文。墓葬年代为春秋中期。^[23] 枣树林 M129 的墓葬规模,随葬的编钟、编磬和钟上“曾公”及戈上“曾侯得”铭文,再结合墓地布局,可证其为春秋中期紧接曾侯宝之后的曾侯得墓。

1979 年,在随州义地岗南部的季氏梁西侧,农民取土时发现 1 座长方形土坑墓,墓底长 2.8 米、宽 2 米,方向 302°。随葬铜器有鼎 1 件、甗 1 件、簠 2 件、编钟 5 件、戈 2 件,以及车马器等 37 件。其中 1 件戈铭“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墓葬年代为春秋中期。^[24] 此墓葬规模及随葬器物组合均未达到曾侯墓之规格,由前述戈铭可知墓主为季怠,官职大工尹,是曾穆侯的儿子,西宫的孙子。曾穆侯在世亦应在春秋中期。考虑到曾公𦣻、曾侯宝、曾侯得三墓年代相连续,尤其是曾公𦣻墓随葬器物有春秋中期偏早的特点,故同为春秋中期的曾穆侯应为曾侯得之后的一位曾侯。

四、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侯墓

文峰塔 M4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残长 10.05 米、宽 7.6 米,墓底长 8.2 米、宽 7.3 米,方向 35°。该墓被盗严重,仅残存 26 件随葬品。礼器仅见 1 件铜簠残片,乐器为 1 件甬钟,其上有 34 字铭文,记述曾侯佑佐楚王等事。最为重要的是,在 1 件残戟的后戈胡上残留有“曾侯”铭文。墓葬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早段。^[25] 文峰塔墓地已确认为曾侯墓地,M4 墓坑规模较曾公𦣻、曾侯宝、曾侯得三墓的墓坑都要大,且出铭文钟和曾侯戟,故该墓应为春秋晚期早段的一位无名曾侯墓。

文峰塔 M1 为方形竖穴土坑墓,残存墓口长 8.1 米、宽 7.8 米,墓底长 7.1 米、宽 5.9 米,方向 30°。该墓被盗,虽有简报刊出,但残存随葬器物数量则不见报道。从简报公布的钲鼎、升鼎残片分析,推测其器形较大,残存的 8 件甬钟大小仅次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甬钟。在 8 件编钟上有自铭“曾侯與曰”,铜鬲自铭“曾侯與之行鬲”。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26] 此前,擂鼓墩 M1 出土 1 件尊盘及 5 件戟均自铭“曾侯與”^{[27] (P260)}。文峰塔 M1 规模、礼乐器形体较大,均符合曾侯葬制,铜器上又多次出现曾侯與

自铭,可知此墓为春秋晚期的曾侯與墓。

战国早期的擂鼓墩 M1 出土曾侯卣戈 7 件、曾侯卣戟 11 件、曾侯卣受 3 件^{[27](P286)},战国早期的义地岗 M3 出土了 1 件曾侯卣鼎^[28]。据此可知,曾侯应早于曾侯乙。

擂鼓墩 M1,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多、礼乐器组合最全的曾国墓葬。青铜礼器、用具、兵器上共出现 208 次“曾侯乙”铭文。该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 433 年。^{[27](P294)}学术界对曾侯乙墓处于战国早期没有异议。

擂鼓墩 M2 为近正方形岩坑墓,南北长 7.3 米、东西宽 6.9 米,墓底长 6.3 米、宽 6 米,方向为正东西向。该墓早年被盗,仍出土随葬器物 449 件。铜礼器中 9 鼎 8 簋俱全,乐器有 1 套甬钟 36 件,1 套石磬 12 件,该墓没有出土兵器。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偏早。^{[29](P135)}擂鼓墩 M2 的墓葬规模、礼乐器组合,完全符合曾侯墓的规制。但该墓不见自铭曾侯铜器,又根据上文论及的曾侯谏夫人、曾侯伯生夫人、曾公哱夫人渔𤎎、曾侯宝夫人𤎎加等墓葬均不出兵器的特点,可知擂鼓墩 M2 应为女性,是为曾侯夫人墓,故不应纳入曾侯世系之列。

2003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工程建设,在襄阳梁家老坟的一座战国中期楚墓(M11)中,

发现 1 件曾国铜戈,其援及胡部有错金鸟篆铭文“曾侯旻之用戈”。张昌平定戈的年代为春秋末年^{[30](P388)},黄凤春则定在战国早期曾侯乙之后^[3]。由前述文峰塔墓地 M4 无名曾侯、M1 曾侯與墓由北往南排列,年代上紧相衔接,擂鼓墩 M1 所见铜器铭文,曾侯與、曾侯卣、曾侯乙当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再结合戈之型制和错金鸟篆铭文字体特点,将曾侯旻定在战国早期曾侯乙之后较为可信。

文峰塔 M18 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平面呈亚字形,墓口南北长 16.6 米、东西宽 15.6 米,方向 200°。该墓被盗,残存各类铜器 100 余件。2 件方缶和 1 件方壶上分别有铭文“曾侯丙作缶𠬪以为长事”和“曾侯丙作𠬪”。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31]文峰塔 M18 位于已知的曾侯墓地,墓葬规模符合曾侯墓制,又有 3 件自铭“曾侯丙”器,其为战国中期早段的曾侯丙没有疑问。

五、结论

笔者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资料,对曾侯墓葬的规模、礼乐器组合、曾侯自铭等现有曾侯实物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迄今为止能确认的曾侯共计有 15 位,见表 1。

表 1 曾侯世系

序号	曾侯名	年代	曾公曾侯器数	出土地点
1	曾侯谏	西周早期成康之际	5	随州叶家山 M65
2	曾侯伯生	西周早期康王时期	18	随州叶家山 M28
3	曾侯玠	西周早期昭王时期	15	随州叶家山 M111
4	曾侯絳伯	春秋早期	1	枣阳曹门湾
5	曾侯子(巳)	春秋早期晚段	24	传世
6	曾公	春秋中期早段	11	随州枣树林 M190
7	曾侯宝	春秋中期	5	随州枣树林 M168,公安局缴获 1 件
8	曾侯得	春秋中期	21	随州枣树林 M129
9	曾穆侯	春秋中期晚段	1	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季氏梁墓葬
10	无名曾侯	春秋晚期早段	1	随州文峰塔 M4
11	曾侯與	春秋晚期	15	随州文峰塔 M1
12	曾侯	春晚战早	22	随州擂鼓墩 M1,21 件,随州义地岗 M3,1 件
13	曾侯乙	战国早期	208	随州擂鼓墩 M1
14	曾侯旻	战国早期	1	襄阳梁家老坟 M11
15	曾侯丙	战国中期早段	3	随州文峰塔 M18

通过这 15 座曾侯墓的确认,发现曾侯墓葬规模大小、礼乐器组合与数量等,都与曾国国力盛衰有直接关系。西周早期,墓葬规模逐步加大,墓坑为东西向,约在昭王前期出现西向墓道,陪葬马坑 1 座,曾

侯玠墓陪葬马坑增至 3 座。西周早期的曾侯墓,鼎、簋组合是最重要的礼器,同时随葬有方鼎和钺,这是其典型特征。西周昭王时期出现钲钟、甬钟随葬。春秋中期曾侯墓仍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道改

为向东,不仅陪葬马坑,还陪葬较大的车坑。此时随葬器物仍以鼎、簋组合为最重要的礼器组合,显著变化是不见铜方鼎、钺,编钟数量明显增加,镈钟、甬钟、钮钟一应俱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墓坑形制变化较大,或为长方形、或为方形、或为异形,墓坑多为南北向,只有战国中期的曾侯丙墓有南向墓道。随葬器物组合变化不大,但器形大小和精美程度则悬殊较大。有多座曾侯墓的墓地多遵循从早到晚、由北向南排列的规律。已确认的曾侯墓,都有自铭“曾公”或“曾侯”器随葬。已确认的曾侯夫人墓,其墓坑规模都略小于其夫君墓,但葬器仍享用曾侯之礼,一律不葬兵器。西周早期曾侯夫妻异穴合葬墓为前后排列,夫在前(西)、妻在后(东);春秋中期曾侯夫妻异穴合葬墓为左右并列,夫在左(南)、妻在右(北)。

尽管前述所见 15 位曾侯世系之间仍有较多缺环,但可据此确知曾国历史的时间,是由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期。目前能够确认四个曾侯墓地,即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地、春秋中期的枣树林墓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文峰塔墓地、战国早期的擂鼓墩墓地。可知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曾国历史上主要时段的都城及政治中心应在今随州市境内。

参考文献:

[1]张昌平. 曾国青铜器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黄尚明. 曾侯世系考辨[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3]黄凤春. 曾侯世系编年的初步研究[A].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四辑)[C]. 长沙:岳麓书社,2018.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 M65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11(3).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1).
[6]杨宝成,刘森森. 商周方鼎初论[J]. 考古,1991(6).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 M28 发掘报告[J]. 江汉考古,2013(4).
[8]张昌平,李雪婷. 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J]. 江汉考古,2014(1).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 M111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20(2).
[10]朱凤瀚. 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1).
[11]张天恩. 试论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J]. 文物,2016(10).
[12]郭长江. 湖北随州枣树林发现春秋曾国贵族墓地[J]. 中国文物报,2020-04-17(8).
[13]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J]. 文物,1972(2).
[14]襄樊市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5]方勤. 郭家庙曾国墓地的性质[J]. 江汉考古,2016(5).
[16]田海峰. 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J]. 江汉考古. 1983(3).
[17]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7 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8]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 3 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9]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9 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J]. 考古,2020(7).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 2019 年发掘收获[J]. 江汉考古,2019(3).
[22]项章. 随州博物馆藏曾侯匍鼎[J]. 文物,2014(8).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等. 随州汉东东路墓地 2017 年考古发掘收获[J]. 江汉考古,2018(1).
[24]随县博物馆. 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J]. 文物,1980(1).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 M4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15(1).
[2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14(4).
[27]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等. 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 1994 年发掘简报[J]. 文物,2008(2).
[29]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曾国青铜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J]. 考古,2014(7).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